

# 後現代主義與反歷史

• 程一凡

「反歷史」(antihistory) 原為法國年鑑學派所出斯托亞諾維奇 (Traian Stoianovich) 教授在批評福柯 (Michel Foucault) 時所用之語<sup>①</sup>。本文欲把這人們多視而不見的「反歷史」原委提出來，申訴後現代主義扮上歷史的貌來泯滅歷史的性，藉歷史的影來混淆歷史的形，分析對象則限於後現代主義巨擘福柯與修史學家懷特 (Hayden V. White) 二人的理論。

—

1961年福柯的博士論文《痴和瘋》(Folie et déraison) 出版後，聲譽鵲起，法國史界泰斗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在《年鑑》(Annales) 親筆讚揚。在《痴和瘋》中，福柯指出了「論述」(discours) 是代表外在世界的文化介質。《痴和瘋》之所以把「痴」(folie) 和「瘋」(déraison) 對立起來，是因為從中古到近古時期「痴」字的涵義較廣，也較良性，而到了近現代，人們改用「瘋」，轉而壓制「瘋狂」。故不是這種病或現象改變，而是人的語言表述

(representation) 改變，由語言入手研究問題可以一正歷史久積之誤<sup>②</sup>。

《診所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是福柯繼續向過去挖掘的進階，書中指出公元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歐洲文化驟然變得猙獰起來，醫師用冷峻的眼光來凝視、檢視、鄙視病人，於是診所的誕生正象徵這種不人道，「近代」的到來意味着新的壓迫與蹂躪。書中對「古典時期」(age classique) 的憧憬是明顯的，所謂「古典時期」就是十七、十八世紀，之前他稱為文藝復興或「古典前」，之後他稱為「近現代」(moderne)。就方法論而言，福柯不願意對這種歷史性的巨變提出解釋，避談甚麼遠因、近因，也不去找尋先例、源頭，更不過問人事的衍伸、影響。變化的體現只是驀然的、截然的斷痕，而這種斷痕之所寄正在於芸芸語言(如醫師的術語等)<sup>③</sup>。

1966年出版的《言物之間》(Les Mots et les choses) 主要以語言學、經濟學、博物學三種學科為例，討論人類認知機制的突變，福柯明言他所做的工作與思想史、科學史截然不同。他提出橫互在以上所說「論述」

1961年福柯的博士論文《痴和瘋》出版後，聲譽鵲起，《痴和瘋》之所以把「痴」和「瘋」對立起來，是因為從中古到近古時期「痴」字的涵義較廣，也較良性，而到了近現代，人們改用「瘋」，壓制「瘋狂」。所以不是這種病或現象改變，而是人的語言表述改變，由語言入手研究問題可以一正歷史久積之誤。

\* 本文為壓縮稿，全文將在《二十一世紀》網絡版刊出。

之下的是一種潛意識的、先意識的識根 (episteme)，識根是福柯從語言學中參悟出的我用以認識物的基本方式，從文藝復興通過古典、現代一直到當代，識根經歷了四個時期，而每個時期都有它統一的、跨科系的識根。尋找識根必須從論述而不能從人的思想或意識着手，他要抽去所有被研究的思想家、科學家的生平、心態、世界觀等，也不看從一個科學家到另一個科學家間思想的辯證影響，他說思想史家跳出作品以外找關係、作理解，這樣只是搞「魔術」④。

福柯對「現代」這一時期的處理特別值得歷史學家注意。「現代」在書中亦稱「歷史的時代」，因為福柯認為歷史學可以總括現代知識，屬於現代的識根是「類比—取代」(analogy-succession)，後者的意思就是在時間的橫軸上排生滅起伏，這種識根把知識成象 (configuration) 的取決權給了時間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個例子)，驅走了古典時期的論述空間，語言倒成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接受時間的排配。要緊的是福柯認為這種「歷史天下」只是一種假像，是在「真」歷史喪失之後的一種補償，甚麼是真歷史呢？(註：「真」「假」是我的話)《言物之間》說得很清楚，古典時期中人們有一些認知的欲望卻又不離原有的社會、宗教網絡，也就是說未經社會疏離的人才真有真歷史，可以說真歷史是反自覺、反分析的，那麼自覺、理性的歷史當然就是偽歷史了。正因為久久靠邊站的語言能重調現代人知覺 (cogito) 與弗思 (unthought) 間的關係，能化無序為有序，所以到了當代 (即現代之後) 論述的空間終將 (自古典期) 重返而攆走歷史的時間⑤。

我們應可看出福柯對現代性 (modernity) 的厭棄，《言物之間》可看

成是繞了大彎來打擊人文科學 (sciences humaines) 等代表現代理性精華的一篇宣戰書。福柯日後倒述當時心態之時，有些悔意地說他一生中探索的有三個問題：真理 (的問題性)、權勢、個人行為，在這一段時期，他承認只注意到了前兩個而「沒考慮到第三個」問題⑥。也就是說他有心在人文問題上留下空白來，從文藝復興，經由啟蒙運動，一直到二十世紀的新個人主義的人文傳統，他要一概推倒，另覓蹊徑。

福柯三年後推出《知識考古學》(L'Archeologie du savoir)。本書的意義在用語言哲學的語言來描寫他所謂的「考古學」是何物⑦。本書中不再見「識根」，因為該觀念太過強調了「同」的原則，正如伯諾爾 (James W. Bernauer) 已指出，《考》書中很重要的—個原理是「分別」⑧，與以上提的「類比」方法恰好對立。象徵現代性的另一半識根——興替取代——也必須清除。《考》書說得很清楚：舊的考古學向歷史學看齊，規規矩矩地去排時間、搞復原，新的歷史學倒應向考古學看齊，任由空間來抹煞那線性的時間。他的考古學顯然是要擺脫時間的束縛，強調的是論述們「自化」(transformation) 的本領，這種自化不必向論述以外的任何東西 (包括思想家本身) 負責，所有的「繫年」功夫對他來講都是外加的，於是時序、日曆全可斥退 (他叫「吊空」)。就福柯而言，時間中所蘊藏的機變是個既已知又不必處理的死灰，之所以他要歷史向「考古」學習，是因為研究對象都已經死亡、僵直、敲定。福柯常掛在嘴邊的是「必然」與「規則」，但這種偽裝積極主義 (positivism) 的羊皮僅為引誘讀者脫離那體驗的 (empirical) 厚土。「機變」(contingence) 和「自由意志」

福柯《知識考古學》一書的意義在用語言哲學的語言來描寫他所謂的「考古學」是何物。《考》書說得很清楚：舊的考古學向歷史學看齊，規規矩矩地去排時間、搞復原，新的歷史學倒應向考古學看齊，任由空間來抹煞那線性的時間。他的考古學顯然是要擺脫時間的束縛，之所以他要歷史向「考古」學習，是因為研究對象都已經死亡、僵直、敲定。

(free will) 非渠所關心，因為他把知識和意識分了家，人與言也南轅北轍，他腳下踏的只是語言理想主義的高橋，把變化的因果、替代、興廢全都懸吊起來，於是文明的起落，「政體、戰爭、饑荒」等傳統的歷史課題對他而言都僅如浮雲。他聲稱要往「深層」挖，但他憧憬的「深層」是個時間已成鈍態的純空間<sup>⑧</sup>。

在布羅代爾等引薦下，福柯於1970年秋入法蘭西學院，次年即發表了〈尼采·系譜·歷史〉(“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一文，文中極盡對歷史學本身的詆毀。大家不免奇怪：福柯不是以歷史起家的嗎？在該文中他只安排給歷史一項工作——「治療」。從拉康心理分析來說，福柯所為是通由否定而真幻良莠易位，從最早的《癡和瘋》、《診所》等作品開始，我們可以看出福柯相信不借助歷史的力量不足以摧毀現代性<sup>⑨</sup>。但卻因為歷史學本身已經代表了現代性，故歷史為福柯帶路，其最終的目的地卻是它自己的墳墓。

所以福柯正是扮上歷史的貌來泯滅歷史的性，歷史之性在於依據時間來理解過去發生的事件，福柯着意要用論述的空間來擠走時間，用層出不窮的論述來遮蔽事件前後的連環。是因為福柯根本上漠視過去，蔑視記憶，甚至在認知上嘲弄現實，而歷史學正是對現代認知力量的肯定與實踐。眼見現代性與二十世紀歷史學的緊密結合，福柯意會不扮上歷史之貌不足以蝕史、腐史、脹史、餒史，亦即無法拉現代性下馬。故雖然從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上溯至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乃至於個別十八世紀語言學家已或多或少地為福柯提了詞，後現代主義不經由福柯之化裝表演(masquerade)則無以興。

自70年代中期起，福柯與法國史學界關係隨着他本人聲望的提高反轉冷，他有時不得不聲明他之所為並非史家工作，而法國史家也漸漸覺察到福柯並非吾類。1975年布羅代爾自己也說出福柯並非史家(nonhistorian)而是哲學家的話。在此以前，福柯自己在演說中已批判了門牆(discipline)觀念的束縛性，間接指出他自己是科際間的新變種，科際學的發展是後現代主義學術上升的又一梯階<sup>⑩</sup>。

## 二

後現代主義之興帶給一些有心人的鼓舞是難以言喻的。美國學者懷特在《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學刊的邀請下在1973年寫了一篇討論福柯著作的文章，對福柯讚揚有加，福柯鼓吹的認知代表(介於物我之間)對懷特而言是在認識論的基礎上給予了他自己對歷史的解讀及時的翼助。但作懷特的討論有兩個問題：第一是他在90年代曾否認他屬後現代主義，而只承認他是結構主義者(structuralist)，從法國近代的作者觀來看，這樣的否認並無意義。另一個問題是在70年代之前，懷特自己由繼承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學說而已經對歷史學事業有了由衷的懷疑，但這一點評家卻多半輕易放過了<sup>⑪</sup>。

1973年懷特出版了《拔史》(*Meta-history*)。本書所提的問題是史家所必爭的甚麼是十九世紀歷史學本質的問題，全書運思之妙，堪稱傑作。懷特把歷史學問分成五個層面：曆紀(chronicle)、故事(story)、布局(emplotment)、說辯(mode of argument)、意識形態，但貫穿全書的是他借自維柯(Giambattista Vico)的

自70年代中期起，福柯與法國史學界的關係轉冷，他有時不得不聲明他之所為並非史家工作，而法國史家也漸漸覺察到福柯並非吾類。1975年布羅代爾自己也說出福柯並非史家而是哲學家的話。在此以前，福柯自己在演說中已批判了門牆觀念的束縛性，間接指出自己是科際間的新變種，科際學的發展是後現代主義學術上升的又一梯階。

四種假喻法 (trope)：化喻 (metaphor)、繫喻 (metonymy)、部喻 (synecdoche)、反喻 (irony)。懷特認為一本歷史著作的完成，先有曆紀，把時間與事件聯結起來，由曆紀演進到故事要加上情節潤色。故事要穿針引線，這就是布局，一層層地史家順着他的潛意識把所有的層面填滿，這個過程懷特稱之為「踐形」(prefiguration)，由於是語言泄了潛意識的底，懷特就提出「語言底稿」(linguistic protocol) 論。這本是用文學批評手法來透視「歷史」作品，懷特卻因此強調史學的科學性不足<sup>③</sup>。

懷特所重視的喻法為其史論精華，對他而言喻法就是史法。四喻中，最受懷特偏愛的是反喻，照他說該喻境界最高，而其他三喻則顯得樸素無華 (naive)。這三喻中最基本的是化喻，它常是代表本身或是倚重代表手法的，像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形容歷史是「一團混亂」，這在懷特處算是純代表。繫喻則代表思考者假設了在事件背後有因子或經紀的操縱，部喻則代表思考者重視整體中部分與部分的關係或整體與部分的關係，這兩喻是懷特最不欣賞的，因為它們太靠近科學，書中派為用繫喻或部喻的主要是德國歷史學派學者 (如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和對歷史做了深入省察的理論家 (如馬克思)。反喻有自覺性，使用者可以與被喻對象保持一定距離，這種距離即反映於嘲諷 (自嘲或諷他) 中。反喻之所以超拔，是由於它不鏗入、不參與、不去看它那些斷爛朝報，也不去作那事事關心，這種如克羅齊式的離境，正是懷特「拔史」(metahistory) 之義<sup>④</sup>。

如此拔史是反歷史的，因為它推開了歷史中本身的架構與形體，而僅以布局措辭——即歷史形體在語言介質中的投影——作為歷史的「底稿」，

則不啻是車置馬前。維柯之喻論本以言詩，詩史豈為一物？難怪懷特奉克羅齊之說把歷史學最重要的研究構思部分稱為「入門小學」(propaedeutic)，然而英美修史學 (historiography) 討論竟迹其影而開始做「語言轉向」<sup>⑤</sup>。

### 三

反歷史要與歷史學本身並駕齊驅、相得益彰是困難重重的，但修史學的領域卻是它的優生環境，一部分原因是歷史界目前的修史討論理論層脆薄至極。於是《拔史》問世之後，十年後安克斯密特 (F. R. Ankersmit) 的《敘事邏輯》(Narrative Logic) 出，不數年凱爾納 (Hans Kellner) 的《語言和歷史的代表》(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亦出，自此以往，後現代式的修史學討論碩果累累。安克斯密特更是員猛將，對既有史學概念多所摧破。他說：時間本來就是一種想像出來的玩意，敘事以時間為軸是西方文化獨有的，所以要把時間作為敘事文的骨幹 (如利科 [Paul Ricoeur] 所論)，不啻是「流沙建塔」。他也不認為像「文藝復興」、「勞工運動」這些名詞背後真有個過去的實體，而僅為存在於歷史代表體中的架構而已，「過去」對他來講竟是那樣一個難以捉摸的東西。正因為沒有客觀公式可以保證過去事實重建的正確，所以他認為歷史永不能成為社會「科學」。但入了二十一世紀以來安氏似乎從「破」而漸漸想到「立」的問題，例如他雖然仍堅持歷史與「過去」的關係是不定的 (indeterminate)，但他可以接受別人 (非他自己) 把歷史認做社會科學的可能性。我們再看懷特的及門凱爾納，凱氏繼承師說，認真咀嚼了語言在歷

安克斯密特是修史學猛將，對既有史學概念多所摧破。他說：時間本來就是一種想像出來的玩意，敘事以時間為軸是西方文化獨有的。他也不認為像「文藝復興」、「勞工運動」這些名詞背後真有個過去的實體，而僅為存在於歷史代表體中的架構而已。「過去」是難以捉摸的東西，所以他認為歷史永不能成為社會「科學」。

福柯在歷史界的「傳人」貝內在自己的寫作中(尤其在70年代)雖然盡力張大福柯聲勢，但他80年代的作品已經嗅不出後現代主義的氣息。這是因為基本的、根深柢固的問題沒有避開：你是反歷史？還是認真搞歷史？只有兩條路，貝內的處境說明了這選擇的無可或逃。

史著作中的地位，雖然其「歪搞故實」(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之義(渠書的副標題)使人憂疑那「一正故實」(to get the story straight)的日子已成過去，但凱氏卻不乏側面地對史學著作語意雋永的點評<sup>⑩</sup>。

反觀福柯在歷史界的「傳人」貝內(Paul Veyne)則情況相反，貝內為福柯在高師教書時的老學生，後引進法蘭西學院。貝內攻羅馬史，他在自己的寫作中(尤其在70年代)雖然盡力張大福柯聲勢，但他80年代的作品已經嗅不出後現代主義的氣息。這是因為基本的、根深柢固的問題沒有避開：你是反歷史？還是認真搞歷史？只有兩條路，貝內的處境說明了這選擇的無可或逃<sup>⑪</sup>。

總的來說，反歷史的發展花分兩枝，福柯的影響雖然大，但將其反歷史的學術與歷史融合則談何容易，反歷史在貝內身上的乾沒(曾記否：貝內曾高呼「福柯給歷史帶來了革命」)是個例子。經由懷特打通的在修史學中的路則是條康莊大道，第二代的作品有更上層樓的表現。但是當安克斯密特愈來愈重視具體的歷史問題討論，愈來愈由文藝理論轉入歷史理論時<sup>⑫</sup>，反歷史的力量也就不覺愈來愈減弱了。

### 註釋

① 「反歷史」：Traian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209等，懷特選用「倒歷史」(counterhistory)一詞形容福柯之學，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31。

② 布羅代爾主編附筆，*Annales: Economies, Societes, Civilisations* 17, no. 4 (juillet-aout 1962): 771-72。《痴和瘋》後改名《古典痴史》

(*Histoire de la Folie a l' Age Classique*)；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 Richard Howard (1965; repri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

③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凝視問題」，見Martin Jay,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④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296。以下簡稱OT；「跳出作品」：Foucault,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in *Foucault Live: Interviews, 1961-1984*, ed. S. Lotringer, trans. Lysa Hochroth and John Johnston (New York: Semiotext(e), 1989, 1995), 22；「魔術」：OT, xiii。

⑤ 見OT, 369-70等。亦可比較海德格已經提過的問題，見Michael Schwartz, "Epistemes and the History of Being", in *Foucault and Heidegger*, ed. Alan Milchman and Alan Rosenber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174-76。詹姆遜很早就注意到後現代主義中空間觀念的擴張：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46 (July-August 1984), 71。

⑥ 福柯書中的「人文科學」(sciences humaines)是小心翼翼地定義的，指社會學、心理學等，這個名詞的提出就輕巧地避開了"sciences de l'homme"，後者是布羅代爾常用的詞語。福柯一直保持後者的正面形象，至《知識考古學》出而不渝，表示他支持後者而反對前者。見Foucault, *L'Arche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69, 1980), 43；「三個問題」：Foucault Live, 466。

⑦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以下簡稱AK)。批評本書方法論的著作甚夥，謹從略。

⑧ 「分別」：AK, 4, 170-71, 205等；James W. Bernauer, *Michel Foucault's Force of Flight*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0), chap. 4.

⑨ 「看齊」：AK, 7；「吊空」：AK, 167；「文明」：AK, 4-8。

⑩ 「歷史起家」：尤其是很多哲學家動輒冠福柯以「歷史學家」頭銜。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his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and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6；福柯最早的著作是《精神病和人格》(*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é*)，後改名為《精神病和心理學》(*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logy*)。

⑪ 「年鑑學派學者與福柯關係」：Gerard Noiriel, "Foucault and History: The Lessons of a Disillus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6, no. 3 (September 1994), e.g., 551-53. Braudel, "Foreword", in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16; Foucault, "Orders of Discours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0, no. 2 (April 1971): 15-17，後改題為"Discourse of Language"，並收入AK。

⑫ Hayden V. White, "Foucault Decoded: Notes from Underground", *History and Theory* 12, no. 2 (1973), e.g., 45. 此文後收入氏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懷特自影」：Domanska, *Encounters*, 14；White,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On History and Historicisms", in Carlo Antoni, *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 The Transition in German Historical Thinking*, trans. Hayden V. Whit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White, "The Abiding Relevance of Croce's Idea of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5, no. 2 (June 1963).

⑬ Hayden V.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以下簡稱MH)。「語言底稿」：見MH,

1, 426-29等；「歷史不是科學」：例如MH, 3, 12-13, 428。

⑭ 「四喻討論」：MH, 37, 286等；「卡萊爾」：MH, 143-44；關於喻的劃分，當然還有些零碎。書中把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這個正牌史家也列入反喻使用者，但這是曲解，布氏充滿了儒士濟世情懷，怎麼說也落不到悲觀消極上去；書中也多次提到尼采的「反喻」思想方式就是拔史的意思，如MH, 41, 69等。

⑮ 「入門小學」：MH, 385；「語言轉向」：F. R. Ankersmit,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is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s chap. 1。

⑯ 「理論脆薄」：參考Prasenjit Duara, "Why Is History Anti-theoretical?", *Modern China* 24, no. 2 (April 1998)；「利科」：F. R. Ankersmit, *History and Top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chap. 1；「勞工運動」：idem,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chap. 2；「難以捉摸」：chap. 9 (1998)；「客觀公式」：idem,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3)；Hans Kellner,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⑰ Paul Veyne, *Writing History: Essay on Epistemology*, trans. Mina Moore-Rivoluceri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idem, *The Roman Empire*, trans. Arthur Golham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⑱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63-74；Paul Veyne, "Foucault Revolutionizes History", in *Foucault and His Interlocutors*, trans. Catherine Porter, ed. Arnold I. David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程一凡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學博士，攻思想史、史學方法。曾任教匹茲堡大學、愛荷華大學等。